

中央宣傳部叢書



和議與組府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和議與組府

目錄

卷頭語

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周佛海
和平運動的熬鍊	中華日報社評
和議之實現與國民政府之重建	中華日報社評
和議與政權	中華日報社評
組府問題	中華日報社評
阿部首相的談話	中華日報社評
我們的態度	中華日報社評
問題與結論	中華日報社評



MG
D693.09
495

卷頭語

組府問題，是目前實現和平的一個必經階段。因為重慶政府，已成爲共產黨把持下的地方政權，牠不是代表國民黨的政府，不是代表中央的政府。現在，我們爲着要能代表整個民族國家利益，對外能自主，對內能民主，改組國民政府，是必要的。

我們體味出中國現代歷史過程中的急遽性，與世界現代歷史的轉捩點相結合，中日戰爭的確已趨自然結束。惟構和有待于主體的建立，自非組府，無以謀和，亦無以謀全面的和。組府問題的性質與內容，既經成爲中國當前的必然要求，但有些人只把牠當做酒後茶餘的談話資料，而且不負責任的發問『什麼時候組府？』『組府能夠成功嗎？』那不但是把這個問題看得太呆笨了，甚至是把牠的目的也單純了。

組府問題既是和平運動當中極重要的階段之一，這個階段是必須經過的。在走上這個階段之前，國人都應當把它當作一個問題來考察，來研究，纔可以根據這種考察與研究來守住國家民族的立場。官僚與投機者是沒有資格來處理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需要努力于三民主義的革命者來處理。

現在，綜合中外多方面關於組府問題的名著，彙集成冊，以供關心當前國事者之研考。

關於組織中央政府

周佛海

一般傳聞，先說中央政府，定於雙十節成立；以後又說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辰，一定實現；現在又說明年一月一日，必可成功。但是雙十節過去了，總理誕辰也過去了，中央政府並沒有成立。現在，一月一日，也漸漸的快到了，中央政府的成立，還沒有一些動靜。於是種種的懷疑和揣測，到處都可以聽得見。大家都以為汪先生組織中央政府的計劃，終於失敗了。汪先生的和平運動，不能成功了。於是反對和平的人，就幸災樂禍的歡欣鼓舞；贊成和平的人，也就垂頭喪氣的悲觀絕望。汪先生的組府計劃，真的失敗了嗎？汪先生的和平運動真的不能成功嗎？組府計劃，就是這次運動的最後目的嗎？組織中央政府，於國家有利嗎？這些問題，都有研究清楚的必要。現在特一述個人的所

見。

汪先生這次所領導的運動，當然不是以組織中央政府的本身爲目的。組織中央政府，不過是和平運動的一個過程，不過是救國的一種方法。組織政府的本身，決不是目的。如果汪先生祇是以組織政府爲目的，而不顧及國家的利益，老實說，我們老早已上了權了。那裏能等到今天，還在人家的揣測和懷疑？我們也曾聽見許多故意捏造的謠言；有些說，因爲既成政權的反對，所以汪先生不能上權；有些說，因爲日本的不同意，所以中央政府不能實現。但是我們敢放肆的說，如果我們只是爲組織中央政府而組織中央政府，換句話，如果我們只是爲取得政權而組織中央政府，再說得露骨一點，如果我們只是爲個人權利祿位而組織中央政府，我們犯不着這樣的慘淡經營，艱難締造。老早加入既成之局，樹立起中央政府了。我們堅決的主張和立場，乃是：如果中央政府的樹立，於國家沒有利益，我們情願終生亡命，決不冒冒失失的隨便上權；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於國有利，我們是不避艱險，不辭危難，要挺起身來，擔

負這個責任的。外面所傳雙十節，總理誕辰，以及明年元旦，都不過是揣測之詞。實際上並沒有這種決定。我十月間赴東京的時候，日本各方面，都以中央政府成立的時期問我，我答覆他們說：『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時間的問題，乃是條件的問題。如果條件足以救國，我們就立即着手組織。否則，我們是永遠不會組織的。』我告訴日本友人的這幾句話，現在再拿來告訴我們的同胞。這乃是汪先生的主張，這乃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先來檢閱組織中央政府，是否於國有利。

有些人說，你們的和平運動，我們是同情的。但是爲什麼要組織中央政府？重慶政府，既然不能消滅你們再來一個中央政府，不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年以前的西班牙嗎？不是要把外戰變成內亂嗎？不是上了日本人以華制華的當嗎？這些話驟聽起來，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如果，抗戰的前途，確能得到最後勝利，我們是不應該組織中央政府的。如果重慶當局，能夠開始停戰，和平的交涉，（第三國調解或直接交涉，暫置不論。）我們的中央政府，也不應

該樹立的。但是最後勝利，是毫絲沒有把握的。這個道理，我在『回顧與前瞻』和『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和今後的地位』兩文中，已經說得很詳細了。一個國民，那裏有不情願，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打勝仗的呢？但是事實究竟是事實，希望是不能變更事實的。重慶講和，現在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說蔣先生祇顧私人的權位，完全不顧國家的利益，我是不相信的。如果說他不明白和戰的利害，我是更不相信的。但是他的地位，他的環境，不容許他講和。所以他唱出要日本先撤兵，然後再講和的一種連他自己暗中都要好笑的超常識的議論。翻閱從古到今的中外的和戰的歷史，都是先停戰，再議和，然後再撤兵的。從沒看見先從撤兵做起，最後纔做到停戰的。如果日本真的於停戰議和之前先撤了兵，那豈不是中國打了勝仗嗎？還要什麼和平交涉呢？重慶既然在這種超常識的空氣之下，那裏還準備議和呢？重慶既然沒有勝利的把握，又沒有議和的準備，我們就不能眼看着中國就這樣淪亡下去，而不組織中央政府來担负這個和平的使命了。

我們深信組織中央政府，担負和平的使命，於國家是『有利的』的，最少的限度，確實是『無害』。

爲甚麼說有利？因爲由汪先生所領導的中央政府來議和，可以得到較好的條件。我們當然知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要憑利害，是不能以對人的好惡爲轉移的。但是人類總是感情的動物。感情的作用，並非不能完全影響國與國之間關係。汪先生這次犧牲一切，挺身出來，爲中國挽救危亡，同時爲日本解決困難，這種偉大的精神，是可以使日本人感動。我兩次到東京和半年來和日本友人接觸的結果，深知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對於日本精神的影響，實在很大。日本民族，是富於感激性的，這是日本民族性的優點，我們應該認識的。他們既然是富於感激性的，所以他們以爲中國，爲日本，爲東亞，不顧生死，出而主張和平的汪先生爲對手來議和，和以與他們惡戰苦鬥了兩年以上的重慶政府爲對手來講和，心理上，情緒上，是完全不同的。因爲有這個不同，所以他們對於重慶政府所要求的必多，對於新中央政府所要求的必較少。這從日本民族的

特性來看，一定是不會錯的。這還是從理論來說。根據我的體驗，事實也是如此。我是奉命任外交折衝的。我以前雖然沒有辦外交的經驗，但是我深感覺這次我們和日本折衝，和普通的外交，完全不同。普通的外交，是只替自己打算，不為對方設想的。這次我們的折衝，固然雙方都為自己的國家打算，但是同時雙方都互相為對方設想。我在交涉之初，就對日本同志表示，我們此次交涉，雙方都要有種特殊精神。就是日本不能以戰勝國自居，中國不能以戰敗國自處。如果日本站在戰勝國的地位，自己為刀鋸，而以中國為魚肉，我們是受不了的。如果我們受不了，和平是沒有希望的。同時，中國也不要忘記喪了許多師，失了許多地，實際上是打敗了仗的。如果打敗了仗，還一點點虧都不肯吃，和平也是沒有希望的。日本不要以戰勝國自居，就是不要向中國要得太，不要使中國吃虧太大。中國不能不以戰敗國自處，就是不能不多送給日本一點，不能不多吃一點虧。如果日本能以軍事力量，完全滅亡中國，或者中國能夠以軍事力量，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那乃是另一問題。如果兩者都不

可能，上述的精神，中日雙方，都要具有，然後和平纔能成功，纔能永久的。我們的折衝，便是根據這種精神。而以日本向我們要求的時候，他們常常爲我們設想，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條件，新中央政府是不是還站得住，是不是還可以見諒於國人。我們拒絕日本的要求的時候，我們也常常爲他們設想，如果連這一點我們都不答應，日本的國民，是不是會反對他們的政府，是不是要使他們發生內政問題。像這樣一方面爲自國打算，同時互相爲對方設想的精神，假使東京和重慶講和，一定是不會有的。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講和的條件，一定要比較苛刻，中國的損失，一定要較多較大。因爲一個是以友好的精神來交涉，想從這個交涉之中，得到公平的和平，一個是以怨恨的精神來交涉，想以交涉的條件作報復的手段。這個區別很重要，只要是冷靜觀察的人，一定可以認識的。

我們因爲以上述友好的精神來折衝，所以雖然常常也逢着難關，遇着暗礁，但是都不是沒有方法去解決的。現在雖然還沒有達到最後決定的階段，但

是就交涉經過的大體說，雖然還不能令我們十分滿意，但是恐怕不是重慶政府交涉時所能得到的。日本雖然略有所得，中國雖然準備略有所失，但是中國所準備的失，決不致妨礙中國的生存，獨立，和自由的。談判的條件，雖然在最近的將來，還不便全部公佈，但是我可以負責的保證，除非中國真正得到最後勝利，就是重慶來講和，至多也不過只能得到這樣的條件，恐怕連這樣的條件也得不到。這決不是欺人之談，我們對於歷史，要有交代的。我們不是喪心病狂，難道願意天下後世的人，爲我們鑄鐵像嗎？

我相信一定有人說，條件雖然很好，但是等到你們上檯之後，有甚麼方法，保證日本有誠意，有什麼力量保證日本能實行？這個顧慮，當然是應有而必有的。不過我覺得這也不是毫無把握，至少比最後勝利的把握要多得多。

據我半年來實際的體驗，我覺得至少日本的當局和在野有識之士，是有誠意的。別的不說，就是就這次條件的會談來說，也是一個證明。前面已經說過，這次會談，是以友好的精神來會商的。但是雙方關於利害所繫，得失所關

的地方，爭執依然猛烈，雖然爭到最後，雙方都以友好的精神，尋覓公平的解決，但是爭執的時候，雙方都絲毫不肯放鬆，因此要耽擱了許多時間。我就是從日本爭執得狠厲害之中，看出日本將來能夠實行的誠意。這個理由很簡單，就是：本來預備不實行的事情，何必費氣力去爭？反過來說，就是因為將來不能不實行，所以現在不能不認真的爭。就日本現在的情形來看，是希望中國的中央政府早日成立的。如果他們沒有誠意，儘管我們現在要甚麼，他們答應甚麼，我們怎樣說怎樣好，把我們早點騙上檯。等我們上了檯，他們再來變臉。這樣做法，有何不可？但是他們現在並不如此。因為雙方都狠認真，所以就不能不多要時間，因為多要時間，他們希望早日成立的中央政府，就不能不因此延遲下去。他們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早日成立，一方面條件又要認真商討。因為要認真的商討條件，寧肯讓切望早日成立的中國中央政府延遲。可見得這次所談的條件，他們是準備將來實行的，決不是現在拿來騙我們上檯的把戲。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根本懷疑日本完全沒有誠意。如果要根本懷疑，只好一

直打下去，永久不來講和。如果終有一天要講和的話，我們便一方面不要使人懷疑我們的誠意，同時我們也不要懷疑人家決無誠意。至於說由新中央政府來講和，恐怕日本決沒有誠意，難道由重慶政府來講和，日本便立即變成有誠意嗎？我們決不是和重慶政府，爭着講和，如果重慶政府能夠講和，乃是我們馨香禱祝，求之不得的事情。我現在只說，如果根本懷疑日本完全沒有誠意，那末，只好一直打到底，新中央來講和，他們固然沒有誠意，重慶來講和，他們也決不會有誠意嗎？如果日本有誠意，那末，在重慶不肯議和的現在，新中央政府來和日本議和，我們何必多顧慮，多懷疑？固然，我對於日本將來實行條件，不是絕對樂觀的。我前面說過，日本當局和有識之士，是有誠意的。但是日本除却上級當局之外，還有各級人員；除却有識之士外，不明白的人還多。將來執行條件，全在他們。他們有無誠意，我現在不能確實的答覆。如果他們沒有誠意，將來履行條件，是要遇着許多難關或阻礙的。至少一定會使人感覺得不痛快。不過只要他們的高級當局有誠意，一定可以督促他們中下級人

員去實行；只要有識之士有誠意，一定可以教育一般不明白的人民使他們明白，所以關於這一點，我也不是絕對悲觀的。自從甲午戰爭以後幾十年的血債，要一筆來勾銷，真是談何容易。這種劃時代的歷史事業，不是一件簡單的，當然有許多困難，要我們去克服，有許多障礙，要我們去突破的，那裏能夠看見前面的險阻艱難，便望而却步呢？

再說我們有什麼力量，保障他們履行條件。抗戰如果能得最後勝利，那是另一問題。我現在要問假使重慶來議和，會有什麼力量來保障。我想不外兩種：第一，是托英美出來調停，用國際力量來保障；第二，整理和充實軍備，用軍事力量來保障。這兩種保障，都是靠不住的。國際的力量如果有效，國聯歷屆關於中日關係的決議，老早應該發生效用了；九國公約老早應該把中國救起來了。如果要用國際的力量，來保障日本履行條件，不是欺人，便是自欺。三國干涉遼遼的事，是不能重見於今日的。軍事力量，也夠不上保障。拿軍事力量來保障，不外說日本如不履行條件，我們再來打一仗。現在因為打敗了

仗，纔來講和。如果再打一仗，還是要打敗仗。如果日本沒有誠意履行條約，當然他們也是不惜再戰，不怕再戰的。所以以爲只要我們有了軍事力量，便不怕日本沒有誠意，便可保障條約的履行，那也是靠不住的。

然則我們一點都沒有保障嗎？我覺得我們所有的保障的力量，超過國際的援助，還勝於百萬大軍。這個力量，便是精神的力量，便是決心。

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是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的，是以國家的利害爲轉移的。如果上檯之後，日本不能履行條件，我們會全部撤退的。『條件不履行，我們就不幹』。這乃是我們的決心，這乃是我們的保障。這個保障的力量，是非常偉大而雄厚的。有人說，你們上檯之後，恐怕就想不幹也不可得。這話我不相信。幹的自由，也許不充分，不幹的自由，我們是充分有的。固然，在沒有撤兵之前，我們是在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的，但是我們只要有不怕死的決心，我們是充分有着不幹的自由的。最大的限度，也不過把汪先生以下的同志，全部捉去殺死。如果我們怕死，我們也就不會離開重慶了。老實說，我們

這般革命黨徒，都是窮光蛋出身，決沒有患得患失的觀念。我們都是劫後餘生，雖不敢說視死如歸，至少人家是不能以死來威脅或挾制的。所以如果日本不履行條件，我們是決心拂袖而去的。這個決心，汪先生和他的幹部，都是狼堅強的。我相信日本決不會這樣沒有誠意。萬一如此，我們便自認瞎眼，向他們說一聲『撒約拉拿』，叫他們另請高明去合作。日本如果有心有力來滅亡中國，那是另一問題。如果既無此心，更無此力，就不能不和中國合作。要和中國合作，就不能不使中國國民相信日本有誠意，相信日本不是帝國主義，相信日本尊重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汪先生和他的同志是拚着生命出來主張中日和平和中日合作的。汪先生和他的同志，是誠心誠意的要實行中日合作的，像這樣具有堅強信念和充分誠意而且拚着生命來為中日合作而奮鬥的汪先生，日本尚且不能和他推誠合作，以後還有誰相信日本的話，還有誰敢同日本共事？如果到了這個情形，日本怎樣辦？是不是去找一般失意之徒，無聊之輩，來替他們作爪牙，為他們供驅使？如果這樣，這般人是不是能得國民的信仰，能得國民

的擁護。如果不能，他們是不是有力量和日本協力，來解決中日的糾紛，來收拾目前的時局？如果不能，日本還有什麼路可走？所以站在日本的立場上說，忠實的履行條件，不僅在道義上應該如此，就是在利害關係上也應該如此。因此，我深信我們這種精神上的保障，比較百萬大軍的力量要大得多。不待說，將來不如意，不痛快的事，必定很多，我們決不是今天說不幹，明天說下臺。我們的幹不幹，不是個人出處問題，乃是國家的利害問題。我們不輕易上臺，同時當然也不會輕舉妄動的隨便下臺。但是等到我們盡了心，竭了力，忍無可忍，爲無可爲的時候，汪先生是會領導他的同志，勇退的下臺的。

以上是說組織中央政府於國『有利』。就是退一萬步說，至少也於國『無害』。因爲如果組織了中央政府，會使中國比較現在喪失更多，犧牲更大，那當然是有害的。我們現在姑且不說因爲新中央政府的產生，會使中國喪失較少，犧牲較小，但是絕對不會因此喪失更多，犧牲更鉅。如果喪失和犧牲，都不過和現在一樣，新中央政府的成立，那裏會使局面比現在更壞？換句話說，

照目前的狀態看，新中央的產生，那裏會於國有害。

如果我們在重慶統治的範圍之內，樹立起中央政府，和共產黨在重慶統治的西北，樹立起西北邊區政府一樣，或者會使局面，比現在更壞，或者足以促成重慶的崩潰。但是我們現在要組織中央政府的地方，是已經丟掉了兩年的地方。我們不在這些地方組織新政權，不會使抗戰勝利；同時也不會因為我們在這些地方組織新政權，就會使抗戰失敗。抗戰的失敗，抗戰之得不到最後勝利，另有其他的原因，和我們組織中央政府，沒有甚麼深刻而密切的關係。不待說，將來中央政府成立之後，是有許多人民和軍隊來歸的。表面上這似乎是撤重慶的台。但是這乃是人心思和平將士厭戰的表現。這種根本的精神的原因，會使軍隊和人民，傾心於新中央政府的。如果蔑視了這種一般的心理，而歸咎於新中央政府的組織，那便是抹煞事實的議論。因為如果人民不思和，將士不厭戰，新中央政府，是不能取得一般的同情的。然則在現在這樣事實和心理的狀態之下，組織中央政府，於國家有甚麼害處？

再從對外的關係來說。我前面說過，這次調整中日關係，我們是不能不多少吃點虧的。但是我們進一步來研究，事實上，我們是送東西出去，還是收東西回來？老實說，我們是收東西回來的。固然，這些東西，原來是我們的，但是現在已在人家手中了。如果我們不能以武力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這些東西，仍舊在他們手中。我們實在沒有把日本軍隊驅出中國的把握，那末，這些東西，永久就會在他們手中。我們現在却要從他們手中，把這些東西拿回來。雖然在事實上，沒有全部拿回來的可能，但是總是要努力越多拿回越好。所以與其說我們送掉多少，不如說我們拿回多少。我們假定今後不能因為中央政府的成立，而拿回一些東西，但是至少決不會因為中央政府的成立，比現在還要更送得多。因為東西本來已在人家的手中了。而我們是一無所有，沒有東西可送。所以中央政府的成立，即使於國無益，那裏會於國有害？最大的限度，也不過和現在一樣！

我們不是以國事為兒戲的。我們曾經再四考慮組織中央政府的得失利害。

我們深覺組織中央政府，是必有所得，是必然有利。最低限度，也是萬無所失，必然無害。不戰不和的局面，是沒有生路，只有死路的。我們組織中央政府來調整中日關係，是從死路之中，打開一條生路。如果這條生路打通，我們就可以達到生的目的。萬一此路不通，至多也不過仍舊死而已矣，決不會在死之上，再加一層死。本來也就要死的，如今也不過一死而已。我們深思熟慮的研究了利害得失之後，纔決心準備組織中央政府。我們沒有喪心病狂，那裏願意犧牲國家的利益，來爭權利，逞意氣！

中央政府成立之後，兩個政府的對立，一個時候是難免的。但是如果我們所得的條件，不妨礙中國的生存，獨立和自由，而這些條件又能逐步的切實實行，我們抗戰的目標就已達到，抗戰的原因，就已消滅。抗戰的原因，既然消滅，誰還願意去打無意義的仗，誰還願意去爲無謂的犧牲？不待說，在短時期內，因爲重慶方面的言論統制和暴力壓迫，人民不能認識事實，不能了解真相，不敢發表真正的主張，不敢採取正當的行動。但是過了相當的時期，等到

人·民·了·解·了·真·相·之·後·，·他·們·的·輿·情·，·無·形·中·是·會·逼·着·重·慶·政·府·和·中·央·政·府·合·併·，·而·使·中·國·統·一·的·。·我·是·從·重·慶·出·來·的·。·我·深·知·除·掉·極·少·數·的·人·員·外·，·大·多·數·軍·政·當·局·，·誰·不·希·望·和·平·。·他·們·所·顧·慮·的·是·條·件·太·苛·刻·，·日·本·靠·不·住·。·這·種·顧·慮·，·只·要·是·愛·國·的·中·國·人·，·當·然·是·應·該·有·的·。·如·果·以·事·實·來·表·現·條·件·不·苛·刻·，·日·本·有·誠·意·，·誰·不·願·意·中·國·的·統·一·。·至·於·汪·先·生·所·領·導·的·同·志·，·當·然·不·會·因·為·個·人·的·祿·位·和·權·利·，·而·不·歡·迎·兩·個·政·府·的·統·一·的·。·現·在·聽·說·有·些·人·埋·怨·汪·先·生·的·門·面·得·緊·，·甚·至·說·他·的·左·右·，·尤·其·是·鄙·人·包·圍·先·生·，·閉·塞·賢·路·。·這·種·推·測·，·真·是·太·無·價·值·。·我·們·認·為·參·加·和·平·運·動·，·主·張·中·日·合·作·，·乃·是·義·務·，·乃·是·責·任·，·決·不·是·權·利·。·這·種·神·聖·的·義·務·和·偉·大·的·責·任·，·當·然·歡·迎·許·多·人·來·負·担·，·那·裏·是·少·數·人·所·能·完·成·。·所·以·重·慶·方·面·，·只·要·是·和·我·們·主·張·相·同·的·人·，·我·們·是·極·端·歡·迎·的·。·民·國·十·六·年·，·有·南·京·和·武·漢·兩·個·國·民·政·府·的·對·立·，·民·國·十·九·年·，·也·有·北·平·和·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併·存·，·後·來·都·統·一·了·。·雖·然·過·去·是·純·粹·的·內·政·問·題·，·現·在·參·有·外·交·的·關·係·，·情·形·不·完·全·一·樣·；·但·是·政·治·的·演·進·，·是·千·變·萬·化·

的。半年以前，誰能夢想國社黨和共產黨會合作？但是德蘇居然攜手了。國與國之間，尙且如此，同是中國人，難道會永久不化除成見嗎？不過我所希望的，就是不要把政策的異同之爭，變成個人的恩怨之爭。人生數十寒暑耳，一棺付身，萬事皆了，大家爲甚麼不以國家爲重，而流爲個人的意氣之爭。說到這裏，不禁要說幾句題外的話。我們的特務同志和重慶特務份子的爭鬥，是我們極痛心的事。我們是主張中日和平的。現在和平沒有成功，自己却先互相殘殺起來了，這那裏是我們願意的事。這個責任，重慶是要負的。我們沒派一個人到內地去謀殺任何人。但是重慶却派人到河內去暗殺汪先生，派人到香港，上海來暗殺我們的同志。我們的行動，是完全出於自衛的。重慶的這種行動，除却爭意氣以外，我不知道對於大局究竟有甚麼好處？萬一汪先生不幸，就遭暗算，他的同志，只有加緊努力，實現他的主張的，和平運動，決不會絲毫停頓。其他任何人被暗殺，更不成問題。所以重慶即使能夠暗殺一兩個人，除却逞一時之氣，快一時之意外，於事有甚麼好處？不僅如此，重慶派來暗殺我們

的人，都先後參加和平運動，而爲我們的重要幹部了。僅就這一點，也足以促重慶方面的大澈大悟。所以這種個人意氣之爭，實在太無意義，太無價值。只要大家都以國事爲重，意氣爲輕，我不相信對立的局面，是會永久延長下去的。即使有少數的人，徒逞私人的意氣，在時代的要求和民衆的指摘之下，他們是不會長久存在的。所以我對於中國將來的統一，不僅不絕望，而且不悲觀。這個觀察，不僅根據哲學的推測，而且是根據科學的分析的。

以上把各種懷疑，都加以解釋了。最後說到中央政府，甚麼時候可以成立。中央政府，不如重慶所宣傳，是失敗了；也不像外間所傳聞，是停頓了。既沒有停頓，更沒有失敗。我們正在積極的進行着，就是正在和日本談判條件。前面曾經說過，如果條件不能保證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我們是不會幹的。我們的目的，是要把快陷於萬劫不復之境的中國救起來，如果條件不能使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何必組織中央政府？難道真的要漢奸嗎？但是條件是不能圓滿？我是當交涉之衝的人，我深知雖然還有兩三個具體問題，雙方意

見，還沒有完全一致，但是雙方都是以友好的精神來研究，所以意見的漸漸接近，乃至於完全一致，不單是有可能，而且爲期也不遠了。只要條件全部談判完成，中央政府，就可立即組織起來，以坦負責行這些條件的神聖使命。

總結的說：組織中央政府，是於國家有利益的。組織中央政府，一定是成功的。組織中央政府，爲期是不遠的。全國的同胞，一致起來擁護新中央政府完成他的神聖使命。

和平運動的熬鍊

中華日報社評

蔣介石的幹法是在拖，把什麼都拖光了爲止；而我們的幹法却是在熬，要把和平運動熬鍊成熟。

從國人對於組府問題的關心上，可以看出國人願望和平的迫切，從日本人對於組府問題的關心上，更可以看出中日兩國是在同樣迫切的要求和平的實現；因爲組府問題實在是當前和平運動走入新階級的標識，對於組府問題的關心，雖然不免把和平運動看得單純化了，却也表現了羣衆是在尋求和平運動的具體把握。

可是組府爲什麼不能像人們所猜測的那麼快就成立呢？因爲組府這個階段，正如和平運動的其餘幾個階段一樣，是需要熬鍊纔能成熟的，我們化了一年的艱苦奮鬥，纔把國人的和平心理熬鍊成熟，把日本的和平誠意熬鍊成熟。

現在要把國人的和平心理提高到和平行動，把日本的和平誠意體現於和平條件，當然還需要一番熬鍊的。

組府問題不僅是取決於日本的談判，更主要的還是取決於中國的革命力量的集合。我們組府，不是專門爲了講和，而且是爲了建設國家。無論如何，中央政府的存在如今是中斷了，恢復中央政府的要求，不是從政策的觀點出發，乃是從立國的綱領出發的。因其如此，所以大家總不要以爲，和日本談判妥當了，組府問題便算得到了解決，便不要以爲，除了和日本談判以外，便無事可做了。

本來，要是革命運動能從重慶內部發生，直接把重慶政府改組爲中央政府，那麼，議和的主體的成立便無須經過和日本的談判，倒是可以議和的主體成立之後纔來進行和日本的談判的。可是重慶政府現在已經喪失了中央政府遺產。原來中央政府的基礎是建立在沿海工商業區域之上的，而重慶政府則已經喪失了這些沿海工商業區域，只是還有一羣人聚集在那裏而已。要是和平終

歸無望，中國也是只有採取辛亥革命的方式，在淪陷的沿海工商業區域裏以革命的鬥爭建立起中央政權，辛亥革命的發動地點，如廣州武漢南京，當時就是滿清征服的淪陷區域，而中華民國的中央政權却正是從這些地方產生出來的。可是歷史上，要想把離開了人力物力的心臟的偏安政權回返到中央政權，却是沒有實現過，宋末明末的教訓已夠明白了，重慶政府的前途也是如此。

可是現在我們並不需要採取辛亥革命的方式。辛亥革命是在對征服者的鬥爭當中集合起人力物力，以爲建立中華民國的中央政權的基礎的，而中國現在却是可以和日本合作，從和平運動當中集合起人力物力，以爲重新建立中華民國的中央政權的基礎。方式雖然不同，但集合人力物力這一點却是一定要做到的。如果這一點做不到，和日本談判妥當了還是無用，因爲和議條件可以用談判得到，但和平條件的實踐，中國自身却必須有她自己的力量，而建設這種力量，却正需要較之從事談判更大的努力。

大家要明白，不但組府只是和平運動的一個階段，即使和平運動也不過是

建國的一個階段，組府之後還要完成和平運動，和平運動之後還要復興中國，復興東亞；而集合人力物力這一點，却是組府的基礎，也是組府之後完成和平運動，以及和平運動之後完成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基礎，和這比較起來，關於組府問題的外交談判，不過是一個節目，一番手續而已。所以大家總不要以為，除了外交談判之外，便覺得無事可為，只是坐在那裏等待談判的結果。

為組府而談判，是十分簡易的，但為和平運動而談判組府，便吃重得多了。不但中國方面，組府要有它自身的條件，日本方面的和平運動，也是需要經過一番熬鍊，纔能成熟的。我們必須指出，中日雙方的和平運動現在都還做得不夠，還有待於雙方的努力。大家必須明白，和平運動並非取決於外交談判，倒是外交談判取決於和平運動的程度的。外交談判不過是和平運動的記錄，要想得到好的記錄，必須有好的運動。如果為求語調上簡單有力，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說：七分和平運動，三分外交談判！

和議之實現與國民政府之重建

中華日報社評

汪先生在廣州的廣播演說指出：一、蔣介石已成了和平的阻礙，要實現和平，必須除去這個障礙；二、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及軍人，應當即刻擺脫蔣介石的箝制力量，在自己力量所及之地進行和平運動，先在廣州做起部份的停戰，而以及於全國。這裏包括有兩個問題，是需要國民黨黨員及全國人民來解決的——

第一個問題：除去蔣介石這個和平的障礙，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蔣介石本人能夠覺悟，即刻根絕共產黨，即刻與日本進行和議。抗戰起來之後，汪光生所以還和蔣介石合作到一個相當的長期間；而且離開重慶之後，發表豔電及改最高國防會議書都是採取建議的方式；而且作了這樣的建議之後，等待了一個相當的長期間；就是爲了希望蔣介石本人能夠覺悟。然而事實終於證明蔣介石本

人是不能覺悟的了；那麼，現在要除去蔣介石這個和平的阻礙能有什麼辦法呢？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蔣介石本人雖然不能覺悟的了，但如果重慶內部能夠起來罷免蔣介石，根絕共產黨，聯合全國和平運動的力量，再造國民政府，而和議的主體得以成立，這是最好的。但如果重慶內部已被蔣介石及共產黨劫持到這種地步，以致黨員及人民沒有可能表示意旨，沒有可能從重慶內部來改建國民政府，而和平的要求又已不可能再等待；那麼，國民黨員及全國人民是不是應當在重慶政府之外來改建國民政府，以負起實現和平的歷史任務呢？

第二個問題：和平工作之開始，固然可以是分頭的局部的去幹，但必須即刻有一個中心領導機關，以爲統一的和議主體。假使這種分頭的局部的和平工作之推進能夠影響重慶內部，使之與這種分頭的局部的和平運動結合，並且能夠起來領導，這自然是最好；但如果重慶內部已被蔣介石及共產黨劫持到這步田地，竟來與這種分頭的局部的和平運動爲敵，那麼，這種分頭的局部的和平

運動爲了要避免被各個擊破，是不是應當即刻大家聯合，在重慶政府之外產生一個領導機關，以統一和平力量，除去和平障礙呢？

以上兩個問題是國民黨黨員及全國人民應當即刻起來自己解決的。

我們堅決主張和議必以國民政府爲主體，同時我們堅決主張改建國民政府。日本已往曾經揭發過『打倒國民政府』，『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等口號，在這上頭，我們是絕對不讓步的，我們始終保持和議必以遵守三民主義之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爲主體。但我們認爲，藍衣社及共產黨絕對不能代表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在藍衣社及共產黨指揮下的重慶政府早已喪失其爲國民政府的資格。必須與藍衣社及共產黨指導下的重慶政府斷絕關係，纔能重遵守三民主義之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以爲和議的主體。這個，就是現在擺在國民黨黨員及全國人民面前的迫切課題。

和議與政權

中華日報社評

蔣指揮下之重慶政府現正走向毀滅，我們在作了種種努力挽救無效之後，不得不將當前的形勢爲國人告白，俾國人知所自救。

前線的僵持，因長期的徒然而努力而起的疲勞，已使國人迫切要求一個明朗的目標：或者是拿出戰的辦法來，或者是拿出和的辦法來。但蔣一面言戰以維繫其內部主戰派之心理，一面言和，以維繫其內部主和派之心理，並且利用主戰派牽制主和派，更利用主和派以牽制主戰派。現在是共產黨欲戰；地方軍人欲和，不拘任何方式的和；金融家亦欲和，但須以英國的意志爲意志。目前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還離不開蔣政權。在共產黨的盤算，蔣政府恰等於尼格林政府，尼格林政府直到覆滅的那一天，共產黨還感覺得陣線論不夠施展到盡頭；中國共產黨也要繼續的『擁護』『服從』，直到把一切斷送完結爲

止。在地方軍人，他們有的直接在中央軍的挾制之下，有的因為還沒有出現一個新的政權可以投奔，他們或者由於畏懼，或者由於徬徨，而繼續與蔣保持關係，並且幻想由蔣來和可以少麻煩些。至於在蔣周圍之金融家，則因其密切依賴英國資本之故，非等待英國出面作國際調停不可——而蔣政府之買辦性質的機構，對於這一集團的人物恰恰是最合式的，所以他們也在幻想由蔣來和。而蔣的幹法則是：一面說些硬話以逢迎共產黨，一面表示他能夠和以慰藉地方軍人，一面主張聽命於國際調停以取悅於金融家。同時，他利用共產黨以威嚇地方軍人與金融家，一面又利用地方軍人與金融家以威嚇共產黨，使得三方面都非巴結他本人不可，希望以這樣子的玩弄矛盾來維持他的政權。然而對外形勢的日趨於困難，蔣政府內部的這三方面相互的矛盾亦日趨於尖銳，使玩弄矛盾成爲危險。首先是地方軍人，他們已經懷疑蔣尚有議和之能力，已經開始破壞蔣的威信了。當重慶第一次大遭轟炸，蔣即有遷都成都之意，終因扞格不能實現，再謀遷都昆明，亦遭拒絕。這是鱗隙的開頭。其在金融家，固爲英國退

却，無可爲計，更承英國逢迎美國的意旨，亦思變動內部關係以爲適應，謀以親美派財閥宋子文代替親英派財閥孔祥熙，以結好美國，但同時維持對英原有關係。然而英美合作並不能消滅英美爭霸，毋甯英美合作爲英美爭霸之另一鬥爭方式，其反映於重慶政府者，則爲轉移對英國資本依賴之重心於對美國資本之依賴上，不能是和平的轉移，而是將不能不引起一種政治上的激變，這就是宋子文之所以有上台之說而終於還不能上台的緣故。在這上頭，金融家迫得要重新考慮現成之蔣政權的機構，雖然還找不到一個方案，然而已經有了決心地要想加以某種變革。這是隨卽就會到來的第二個罅隙。地方軍人之離心所引致的蔣政權之動搖，正在催促金融家急起自救，自動的將現成政治機構作某種變革。這兩種形勢一湊合，就夠造成一幕宮廷政變了。這一幕政變的開端將是這樣：蔣愈看到地方軍人與金融家對他離心，他愈將偏重對共產黨之關係以爲對抗，希圖以此對抗來繼續保持諸政治勢力之平衡，並繼續保留他的獨裁於此平衡之上。這麼一來，地方軍人，金融家與共產黨之間的衝突將被引到最尖端，

隨來的宮廷政變將以兵產黨在馬德里巷戰的姿態而表現出來。

蔣要是現在斷然與日本議和，這個局面或者還可挽救。然而蔣絕對不能這樣做；這由於日本之不承認蔣政權爲談判對手，還不及由於蔣政權自身之不能適應。歷史已經說明過無數次，舊政權不能自行蛻變以適應新形勢。上次世界大戰，俄皇在開戰後兩個月即已自知不能戰勝，然而還是戰下去；在開戰後第二年即已願意與德媾和，然而還是戰下去，一直到他的政權覆滅爲止。德皇威廉第二早在共和政府革命之前打算議和，然而也還是戰下去，一直到他的政權覆滅爲止。再如阿比西尼亞皇帝與西班牙的尼格林政府，他們都經過無數次的託人調停議和，也還是戰下去，直到自身覆滅爲止。蔣政權也經多次的託人調停與求和，結果會怎樣呢？結果將一樣的還是戰下去，直到他的政權覆滅爲止。因爲蔣政權是對外不能自主，對內不能民主。對外不能自主，他便不能自己選擇並決定和議的時機與條件。對內不能民主，和戰使只好取決於他個人，而他個人則又取決於他的國際上的主人。他的國際上的主人現在是沒有辦法，

他也就沒有辦法，他也就不會有結果。這個無結果的結果便是政變之不可避免的到來，現在正已踏上了這一步。

民衆應當怎麼辦呢？蔣政權之覆滅既是不可避免的，民衆的打算就只能，不要讓蔣政權覆滅之後剩下中國共產黨與軍閥的天下，大家應當記住：中日戰事尙未了結，大家必須起來了結她。民衆應當起來組織人民的政權來代替蔣家的政權，也只有人民的政權纔能防止共產黨與軍閥的政權的出現。只有對外能夠自主，對內能夠民主的人民的政權成立，平等的迅速的和議纔能實現，戰後復興中國纔有途徑可尋。

組府問題

中華日報社評

對於改組國民政府，許多人發生這樣的問題：組府的時機是否來到了？國民政府經過改組而成立，能否得到金融界與革隊的擁護？中國會不會因此而引起內戰？

他們的解答是這樣——

組府的問題不在其時機，而在其性質與內容。重慶政府已喪失議和的責任能力，而議和已不能再等待；恢復國民政府，以之為議和主體並謀戰後復興，本來是事實的要求與必然的趨勢；而革命者的努力，則在於領導國人去認識並且把握這種要求與趨勢，以堅定的立場，從活潑的行動當中去決定每一個步驟。有些人只在那裏東張西望，不負責任的發問『何時組府？』不但是把問題機械化了，而且是把組府的目的滑過了。時間並不是測量的單位，測量的單位

乃是運動。決定組府的，不是時鐘的擺捶，而是和平運動之進度。國人只能在參加與監督和平運動當中去考察與判斷組府的時機，倘如單獨把組府的時機問題提出來，是一點都不能說明什麼，一點都得出結論的。

至於國民政府經過改組而成立，能否得金融界與軍隊的擁護，這是要看如何樣子組府。我們以爲問題的提出應當是這樣：國民政府經過改組而成立，應當怎樣的努力去取得金融界與軍隊的擁護？並且事先應當怎樣的把取得金融界與軍隊的擁護的問題作爲組府進行中的重要考慮之點，作爲決定組府的性質與內容的重要前提之一？

中國金融界現在與其說是聯繫重慶政府，毋甯說是聯繫英美。事實上資本流入內地的很少，資本的主要部份仍留在沿海都市，以租界爲避難所；而在軍事時期，中日經濟的正常合作既未建立，中國資本被驅逐到租界去避難，這不是由於意志，而是由於不得已。在中日關係未得合理的解決，英美態度未能明朗化之前，中國金融界苟安現狀，維持與重慶政府之原有關係，是毫不值得驚

怪的。從這裏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組府的支點應當是建立在中日經濟合作的平等之上，不但不妨礙，而且援助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以事實祛除中國金融界的疑懼心理；並須做到，以中日合作引致英美的諒解，以此取得英美資本的正常運用，則租界問題可以合理解決，中國金融界自將樂於參加組府，擁護組府支持組府。

說到軍隊，重慶政府現在已經不是依靠抗戰的口號來團結，而是以後線的停戰狀態來欺慰將士厭戰之心；已經不是還有什麼辦法來領導，而是僅僅依靠一些錢來那裏維繫。要是國際間對中日問題的態度一明朗化，對組府的諒解一成立，重慶政府對軍隊的這種維繫也將隨之而無法繼續，那時候，他們一定歸順中央的。

組府果能對日本取得平等，對國際取得諒解，並且對國內取得民主自由，則其國際地位與國內信任，必能保證其爲統一的中央政府，蔣介石的地方政府自必隨之消滅，而不至引起內戰，即有紛擾，亦不過如過去西南事變，不至破

壞統一大局的。組府引起內戰，只有在一個情形之下纔爲不可避免，卽組府而不能獨立自主，不能集合領導全國人民的力量，這樣子不三不四的組府，和蔣介石的地方政府是半斤八兩，兩個半斤八兩不成材的政府纔會弄到我我相打，不可開交。可是，這樣子不三不四的組府，我們是絕對不幹的，而且要反對任何人這樣子幹的。

組府是和平運動當中最重要的一段之一，這個階段是必須經過的。在走上這個階段之前，國人都應當把它當作一個問題來考察，來研究，在走上這個階段之時，纔可以根據這種考察與研究來守住國家民族的立場。官僚與投機者是沒有資格來處理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是要革命者來處理。

阿部首相的談話

中華日報社評

廿一日阿部首相對新聞記者團發表談話，謂日本必承襲近衛聲明原則，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以爲處理對華問題之方針：

一，日本願望中央政府成立後能活潑運用對重慶政府之關係，以統一和局。二，日本要求保持其在東亞的指導精神。三，日本對蒙疆華北比其他地方更爲關心，以適應該地與日『滿』間之地理政治經濟關係，尤其是爲了共同防共。四，日本在華方駐兵問題，當然包括在共同防共的問題之中。

我們認爲——

(一) 將來中央政府能否活潑運用對重慶政府之關係以統一和局，端在此中央政府之產生及其存在之基礎是否健全。重慶政府何以淪爲地方政權？由於投靠蘇俄，依賴英美。故中央政府之產生與存在，其對日本的關係，必須是獨

立自主。阿部首相言及『有謂可以乾脆改組中央政府，乾脆推倒蔣政權者，根據事變經驗，即能明瞭問題不能如此簡單。』這是很透徹的覺悟。中央政府非日本所能改組，蔣政府亦非日本所能推翻。厭棄蔣政權，復興國民黨的中央政府，這是中國人民的事，也只有由中國人民的決心與努力來自動處理的。我們所期望於日本者，即爲日本對中國人民的此種決心與努力，予以尊重，協助中國人民所要幹的，而不指令中國人民怎樣去幹。只有根據中國人民的決心與努力而產生，以中國人民的決心與努力爲支持的中央政府，纔能統一和局，而重慶政府的問題亦得自然解決。

(二)英法合作，英國是居於領導的地位。但此種領導，絕弗統制。日本能否建立並保持其在東亞的領導地位，即在於其能否以英法合作之精神從事中日合作。中國願意與日本合作，以之調整東亞的國際形勢，可是不願意中日合作落入合從連橫的窠臼，以深化東亞國際形勢之對立。阿部首相發表日本對第三國之政策，爲調整而非排斥，中日兩國軍事外交的一致與經濟合作，其對外

任務，原是有如此纔能成立的。此種一致，既由於利害共同，而非由於強力的約束，則中日關係之構成，自然不應當而且也無須包含統制的因素。阿部首相謂「對於新政府，始終尊重中國主權，使之健全發達，此為日本之原來目的。」中日兩國軍事外交的一致與經濟合作，其機構建築，原是有這樣纔能成立的。

(三)汪先生的豔電有云：日本在防共協定期間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為限。在中日合作關係當中，內蒙附近，在一定的期間，由於一定的任務，而有其特殊之處。但此種特殊之處，僅為應付共同防共，而不牽涉到政權的本質。在政權的本質上，必須是絲毫無損於中國主權之統一自主的。其在經濟方面，內蒙附近與日本之接觸特別頻繁，猶之乎意大利北部與德國之接觸特別頻繁一樣，根據此種接觸上的頻繁而產生的合作方式，其特殊之處也只是在合作的方式而已，並不因此影響到合作的本質。中國經濟的完整與自主，即在內蒙附近，一樣是不容有絲毫損傷的。

(四) 駐兵既是爲了防共，故以防共協定期間內爲限，並且至多以內蒙附近爲限。除內蒙附近以外，則是只有撤兵問題，沒有駐兵問題的。阿部首相一再說明駐兵問題包括在防共問題當中，而中日防共協定之精神又是依照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的，如此，則防共必絕對不干涉內政，而駐兵亦有其一定的範圍，是十分明白的。

我們的態度

中華日報社評

重慶方面對於中華日報日前批評『阿部首相的談話』，作種種猜測與曲解，此種猜測與曲解，只是暴露了蔣介石之徒的無知與惡意而已。

蔣介石之徒的說法之一，曰：『此文乃東京授意而撰，以期加強東京方面反對陸軍過度要求之立場者。』

我們却要告訴大家，『阿部首相的談話』一文，完全是根據汪先生的豔電的，而豔電則是十八個月的抗戰的結論。這個結論，又是汪先生及其同志在抗戰之初，乃至在抗戰以前所主張的一貫國策的發展。汪先生及其同志，在抗戰以前，主張避免戰爭，到了戰爭無可避免，主張以抗戰尋求和平；到了可以議和，主張斷然的議和，慎重的議和。這樣說來，豔電不但是十八個月的抗戰的結論，而且是近百年來的中日糾紛的結論，其根據的是歷史的事實，其秉承的

億萬人民的信念。在日本尙未覺悟之前；我們以外交也以抗戰促使日本覺悟。在日本既經覺悟，而且有了近衛聲明之後，我們就提供方案，好叫中日兩國共同負責糾正十八個月的戰爭與近百年來中日糾紛的錯誤，徹底解除其癥結，這就是中日兩國的相互尊重以取得和平合作，這種主張，一直爲我們所信守，而自近衛聲明以來也一直爲日本所信守。『阿部首相的談話』一文是根據豔電而來的，事實上，阿部首相所說明的政策，也原來是根據近衛聲明而來的。

所以，汪先生及其同志在豔電及豔電前後的言論與行動，完全是中華民族的自發的產物，絕非由於外鑠。只有蔣介石這種奴才，根據其請示英美蘇，由英美蘇授意而決定和戰的經驗，纔會覺得獨立自主的抗戰是不可思議的。獨立自主的議和也是不可思議的！也只有蔣介石這種奴才，根據其利用外力以爲內爭的手段和經驗，纔會如此設想，以爲東京政界也是在利用對華事件以爲內爭的手段授意中華日報爲文，『以期加強東京方面反對日陸軍過度要求之立場』！

蔣介石之徒的說法之二，曰：『汪精衛此文係對內而發，企圖在中國民衆

間造成有利的印象者。」

『我們却要告訴大家，我們有一個中心的信念，就是和平運動只有靠誠意，不能靠什麼權謀的。我們絕不請示英美蘇以與日本交涉，而與日本交涉的，我們也絕不欺騙英美蘇；我們絕不歪曲中國人民的志趣以與日本交涉，而與日本交涉的一是一，二是二，我們告訴民衆的亦必一是一，二是二，我們只有一個立場，就是中國人的立場，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和日本說話，也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和英美蘇說話，也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對中國人說話。汪先生及其同志離開重慶是爲了主和，就有豔電與天下人以共見。汪先生及其同志爲了主和，跑到淪陷區，也曾經去過東京，都有報告及說明與天下人以共見的。反過來看看蔣介石，他有過好幾次因爲英美蘇的授意而表示願和，但是他連自己出面來發表願和的談話都不敢，却叫王寵惠他們來說，又是說得吞吞吐吐的，爲什麼？就是因爲這樣子可以成則歸功於己，敗則諉過於人，這樣子可以『在中國民衆間造成有利的印象』！蔣介石並且有過好幾次派遣代表去東京，去香港以及上

海等地，和日本代表進行和議，可是不讓人民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偷偷摸摸的議和，而不與天下人以共見呢？就是因爲這樣子可以躲避人民的監督與批評，有監督一定有攻擊派，有批評一定有責難者，不如瞞住不說，這樣子可以「在中國民衆間造成有利的印象」！

蔣介石之徒的說法之三，曰：中華日報發表『阿部首相的談話』社評，「殆以日方過度要求施諸汪精衛，致使汪難以成立可爲中國民衆接受之政權。」

我們却要告訴大家，這完全是蔣介石之徒的說謊。蔣介石之徒總是以爲，要末不進行和議，如果進行和議，一定是雙方意見早已完全相同了。他們就在等待有這樣子的一天到來，中日意見完全相同，以至於無須談判，不議而實現了和局。他們看見我們在做和平運動，却仍然在對日本堅持，磋商，說明，真是『感覺訝異』萬分了！然而我們的一貫見解乃是，歷史上只有議和，沒有不議而和的。我們主張近衛聲明原則可以之爲開始中日兩國和平談判的基礎，有了基礎，仍然要經過談判，所以仍然要對日本堅持，磋商，說明。對此而『感

驚訝異』，並且猜測中日和平運動的現實距離，是只有蔣介石之徒纔會如此呆頭呆腦，並且以這樣子的呆頭呆腦來賣弄狡獪！關於組府，我們不止一次的說過：組府是和平運動的階段之一，我們必不避免，亦必不苟且。蔣介石之徒已往關於組府的宣傳，總是先來捏造一個消息，說汪派將在那一天成立政權了，過了那一天，就來宣傳『汪派組府失敗』。於是又來捏造一個日期，又一次的宣傳『汪派組府失敗』。這種伎倆，一直沿用到現在，可是已經有所不同了。他們過去宣傳『汪派組府失敗』，總說是因爲『傀儡搶做官不成功』，可是現在，却說是因爲汪精衛此文立場與阿部首相的立場不同了。這不能不說是蔣介石之徒對於我們的認識的一個小小的進步，然而還須學習，即學習認識汪先生之以中國的立場與阿部首相之以日本的立場，固然不是同一物，但在中日兩國的共同前途上，却有其接近之點，這個接近之點也就是近衛聲明及汪先生豔電以來中日兩國間出現了開始和平談判的基礎，這個基礎到了現在是更加鞏固了。

以上蔣介石之徒所加於我們的曲解與猜測，雖然是無知而且惡意的，可是和平運動的開展，終於逼得他們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是以中國人的立場來做和平運動的。所謂『此文的立場與阿部首相的立場不同』，也就是承認我們並不是以日本人的立場來做和平運動的。所謂『企圖在中國民衆間造成有利的印象』，也就是承認果如中華日報社評所說那樣子的和平運動，中國民衆是可以贊成並且參加的。所謂『致使汪難以成立可爲中國民衆接受之政權，……因而彼等均認爲「新中央政府」之成立，或將延遲若干時』，也就是承認汪先生是在努力使組府合於中國民衆之要求。雖然他們在發現了每一個部份的真理之後，加上了『感覺訝異』，並且加上了無知的曲解與惡意的揣測，可是仍然不能自毀其所發現的部份的真理。於此，我們要告訴大家，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做和平運動，雖然到了今天纔爲蔣介石之徒所發現，他們發現了而又自悔其說了出來；可是這正是豔電以來我們的一貫態度，而且也是我們在抗戰之前及抗戰以來的一貫態度。我們認爲中日必須和平，和平運動必然是有前途

的。我們也擔心和平運動會做得不好，可是我們一定要和全國人民大家把和平運動做它好來！

問題與結論

中華日報社評

愛護我們，更愛護和平運動的國內外人士，在私人談話當中，常有對我們坦直表示其對組府運動的反面見解的，以爲和平運動如果能夠不牽涉到政權問題，豈不是要簡易得多？而且國民的和平運動現在雙方都還做得不夠，即使要組府，也似乎時機太早；又以爲日方現在願望和平，急不及待，中國不妨人急我緩，逼日方作更大的讓步。

對於提出這種見解的人，我們十分感謝他們的誠摯，並且以同樣的誠摯提出我們的見解。

我們認爲，和平運動是一種革命運動。歷史上任何革命運動的完成，必然通過政權的改革。中日戰爭拖到現在，並非中國不能和，並非中國只有偏安的前途，而是因爲蔣介石的政權是不能和的，是只有偏安的前途的。蔣介石政權

是依賴國際資本的次殖民地政權，國際調停無望，他也不敢主張，也沒有力量來議和，要想實現和平，必須有一個代表民族國家的中央政府支持其事，這並不是學理上的結論，而是兩年多抗戰以來蔣政權之外交事實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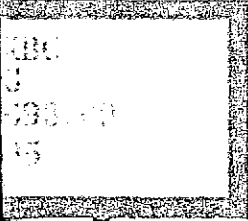
國民的和平運動現在雙方都還做得不夠，這是實情。但必須知道，組府原爲和平運動的環節之一，不通過這個環節，和平運動是會發生停滯的。故組府有其一定的前提，即和平運動必須發展到某種高度，而組府自身則又爲推進和平運動的一個槓桿。和平運動的第一個階段是使國人認識和平，第二個階段是使國人爭取和平。爭取和平，就要有統一力量的焦點，統一行動的核心。組府的要求就在於此。比方說，從何測量和平運動的做得不夠呢？國人還沒有投奔過來，實力派還沒有投奔過來。但是，你沒有一面旗幟，沒有一個行動的機關，叫他們投奔到那裏去呢？僅僅投奔到一種主張嗎？那他們投奔到課堂裏去好了。所以，當和平運動發展到了某種程度的時候，便不能等待和平運動的成熟再來組府，而是只有以組府來促進和平運動的。

至於說日本急於講和，這也是實情。可是我們不要以為這是可以要挾的機會。日本雖然急於講和，但如中國故意延宕，則因外界形勢變化之激盪，將會走到違反本願的結果的。過去日本不願打，中國本來也是不願打的，但是看到了日本不想打，以為打一打可以嚇退她，結果是違反日本的本願，出乎中國的預料，竟一直打了起來。現在日本願和，中國本來也是願和的，但因為看到了日本這樣着急，以為延宕可以逼日本就範，要是這樣子，結果也會是違反日本的本願，出乎中國的預料，竟至於和不了的。而且條件而以權謀取得，交相欺詐，即已預伏條件不能兌現之危機。所以汪先生再三指出，中日和平只有靠雙方的誠意來取得，不能靠什麼權謀的。

國人須知和得不好，一樣的可以亡國，組府得苟且會損害和平運動。但這種警覺，只有鼓勵大家要對和平運動更加負責，要對組府運動更加慎重，其結論不應是消極，而應是積極，只有積極的努力纔能貫徹堅定的立場的。

572

中華民國



月出版